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

倪世雄

[摘要] 本文着重概述了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所作出的四大历史贡献:第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遗愿,推动中美两国建交,实现中美关系的完全正常化;第二,在中美建交后,邓小平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克服各种困难,促进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第三,在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时,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泰然处之,力挽狂澜,拯救了濒于破裂的中美关系;第四,邓小平提出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中美关系;中美建交;历史贡献;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09)05-0023-10

在20世纪下半叶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邓小平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他提出的“改革开放”宏伟战略和倡导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进程。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实践,邓小平形成了他独特的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范,他提出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精辟论述,指导中美关系的重大实践,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学习邓小平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和实践,对掌握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和发展中美关系,有着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遗愿,推动中美两国建交,实现中美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1977年1月,卡特入主白宫,他非常重视中美关系,认为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利益,应该抓住正在出现的新的时机促进这一目标的最后实现。2月初,他在白宫接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4

月,他还特地安排他儿子随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实地了解情况。5月22日他在圣母大学发表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强调美国应制定新政策以面对一个新世界的挑战,他表示愿意与中国改善关系,指出:“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一个核心因素,中国是维持世界和平的一支关键力量。我们希望在全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同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紧密合作,我们希望找到一种方式来弥合把我们双方分开的那些分歧。”^{[1](p.32)}卡特总统的“核心因素论”成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积极信号。

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卡特总统倚重两个关键人物,即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两人对华立场和政策倾向有所不同,后者也许更积极些,但他俩都起了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

1977年8月22日,卡特总统派国务卿万斯到中国作“试探性访问”。第二天,在黄华与万斯的会谈中,双方就出现明显的分歧。万斯阐述的美方立场是:(1)中国必须以公开或默许的形式,作出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的承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05JZD00040]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诺；(2)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3)“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2](p.410)}

8月24日，邓小平接见了万斯，直截了当地说，万斯表述的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了”。邓小平还念了一段他与基辛格博士会谈的记录，基辛格博士表示，美国对中国欠了债，美国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关系正常化。然而，现在美国政府却反悔了，退步了，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针对这一变化，邓小平再次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如果要解决问题，干干净净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的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3](pp.227-228)}

邓小平提出的“废约、撤军、断交”三个条件，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给美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强硬的信息，即美国不应从原有的立场倒退。

以后的事实证明，卡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决心已下，因此支持布热津斯基的主动请求，决定派布热津斯基再次访华，以消除正常化的障碍。^①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一行10人对中国进行了三天访问。代表团成员中，除奥克森伯格之外，还有4位特别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亨廷顿、国防部的阿布拉莫维茨、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和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他们在会谈中将分别为中方介绍战略、经济科技情况及美方立场。当晚欢迎宴会上，布热津斯基说，《上海公报》反映了美国要同中国友好的承诺，是基于共同关心的事项，而且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的，美国并不把它同中国的关系看作策略上的权宜之计。^②

中国领导人对布热津斯基的访华十分重视。5月21日邓小平接见了她，发表了重要讲

话。邓小平强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文件。正常化与不正常化大不一样，在经济和其他领域都会受影响。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解决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1](p.48)}

布热津斯基告之，卡特总统“方针已定”、“决心已下”。布热津斯基说：“美国政府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全球政策中具有中心的重要性。卡特总统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决定同你们（中国）一道克服阻碍两国关系按上海公报完成正常化的剩余障碍。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但希望在美国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确遭到中国的反驳，但这并不是作为条件提出来的。”^{[4](p.369)}

在会面时，布热津斯基还具体建议，双方于1978年6月开始关系正常化的实质性谈判，以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条件。据说，布热津斯基甚至向中国领导人建议1979年1月1日作为建交日期，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同意美方的建议。

在邓小平宴请时，气氛轻松愉快。据布热津斯基回忆：“邓小平不停地往我的盘子里堆放令人开胃的美味佳肴，我们频频举杯。邓小平对他有兴趣访美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还做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评论，大意是他在位只有三年时间了，似乎在强调美中关系的进展有某种紧迫性。我告诉他，希望能在华盛顿我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他微笑地接受了。”^{[5](p.206)}

中美建交谈判从7月5日正式开始。当时，双方谈判在绝密的情况下主要通过三条渠道进行：一是北京渠道，在美驻华联络处主任伍

^①关于此事，布热津斯基博士后来与笔者见面时曾提及。说他访华前，卡特单独会见他，让他向中方表示，美国政府在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决心已下。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②参见席来旺：《举世注目的中美关系》，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德科克与黄华外长之间进行,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主渠道;二是华盛顿渠道,在布热津斯基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副主任韩叙之间进行;三是由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与韩叙在华盛顿接触。三管齐下,可见两国政府对此谈判的重视。

由于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谈判之困难之激烈可想而知。在谈判开始时,中国方面的立场是坚持下列原则:(1)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2)要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政府关于断交、撤军、废约的三个条件;(3)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只可以与台湾保持民间往来,只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4)美国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5)统一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以何种方式统一,别国无权干涉。伍德科克表示,美国将接受中国三个条件,但中国也要接受美国三个对等的条件。第一,美国将单方面发表声明,要求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不公开反驳美国这一立场;第二,美国将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与台湾保持经济、文化与其他方面的关系,美国将根据条约自身条款“终止”而不是“废除”美台安全防务条约;第三,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军事防御性武器。

1978年9月到11月,中美建交谈判进入攻坚阶段,不断出现险情,相持不下。这一时期,邓小平起了关键的作用。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又进一步发出愿意与美国尽快建交的信号:“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华国锋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中美建交需要多长时间?”日本客人问。邓小平回答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断。缔结中日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要像中日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就容易达成协议。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

量了。”^{[5](p.209)}

1998年,我应邀访问密执安大学,时任该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侃如教授安排并陪同我到伍德科克大使家里作客,受到伍德科克夫妇热情接待。伍德科克大使原为美国汽车工人工会主席,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声望,与卡特总统关系甚密,后被任命为美驻华联络处主任,建交后,任首位驻华大使。我见到他时,他已退休。关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连续三次见伍德科克大使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1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他主要是讨论美方提交的一份新的公报草稿。邓小平同意建交日期定在1979年1月1日,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同意对美国到时单方面发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不予反驳;同意建交后美台保持经济、文化关系;同意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根据条约中的终止条款“终止”,而不是“废除”。关于军售问题,邓小平要求美方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仍然有效的一年里不能有新的军火出售,并就此“终止”。伍德科克大使未作回答。最后,他代表美国政府邀请邓小平访美,邓小平接受了这一邀请。12月14日一天之内,邓小平又两次见伍德科克大使,一次是大使向邓小平通报卡特总统提议12月15日宣布建交的消息。由于担心中方把美方承诺一年之内不进行新的军火交易误解为今后也终止军火出售,美国政府指令伍德科克大使再次会见邓小平。理所当然,邓小平听了之后对美方节外生枝、顽固坚持售武立场十分生气,指出如果美国继续向台出售武器,从长远来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但考虑大局,邓小平还是决定,先建交,后谈判,美国对台湾的军售问题建交之后再谈。应该说,先建交,同意搁置军售问题的严重分歧,留到建交后再谈判,是中方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从大局和长远的观点来看,绕过军售难题而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当时情况下,邓小平作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6](pp.206-207)}伍德科克大使对笔者说过,是邓小平的气势、胸怀、智慧和胆识给中美建交谈判带来最后突破。

1978年12月15日(北京时间12月16日),中美发表第二份联合公报,即《建交公报》。公报

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日,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建交声明。中国政府的声明赞扬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卡特总统则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指出,《建交公报》是一个“历史性协议”,中美建交不仅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1979年元旦,新年伊始,中美迎来了两国正式建交的喜庆日子。元旦上午,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分别致电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祝贺两国建交。卡特和万斯也分别回电表示祝贺。卡特在贺电中表示,美国珍视中国人民对人类成就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美国政府愿与中国政府一起,为建立两国之间长久的建设性关系而努力。下午,在出席全国政协的座谈会上,邓小平说1979年元旦不平凡,与过去元旦相比,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7](p.154)}言为心声,毛泽东主席留下的遗愿终于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实现了,这怎能让人不特别高兴呢!

当晚,伍德科克举行盛大招待会。邓小平在祝酒词中说,“中美建交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也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生活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①

二

中美建交后,邓小平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克服各种困难,促进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为了增进中美双方的了解,推动建交后出现的好势头,邓小平于1月28日至2月5日对美国

进行了正式访问。据卡特总统回忆,1978年12月14日,他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令他意外的是,邓小平在24小时之内即作出访美决定。1月28日是中国农历羊年正月初一,羊年大吉,邓小平选择这一天访美具有特殊意义。《人民日报》作了寓意深长的评述:如果说,北京刚刚在鞭炮声中迎来了新春佳节的话,那么,华盛顿的礼炮声则迎来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新时代。

1月29日,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1000多名群众代表和高级官员向邓小平欢呼鼓掌,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邓小平在卡特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与美国星条旗一起迎风飘扬,场面十分动人。卡特在欢迎词中说:“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是人们走亲串友的时刻,也是团聚和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同样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邓小平在答词中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②

在当天晚上卡特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国宴上,卡特再一次称赞邓小平的访问是两国友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邓小平致答词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年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③

在华盛顿期间,邓小平与卡特举行了五次会谈,就双方关切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台

①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②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月30日。

③同上。

湾问题广泛、坦率地交换了看法。一时间,邓小平成为新闻媒体追逐报道的焦点,每晚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段都变为“邓小平时间”,美国掀起了“邓旋风”。据报道,采访邓小平访美的记者近1100人,相当于一场奥运会的规模。邓小平这次访美所受到的隆重热烈的接待在美国是几十年从未有过的。

邓小平一开始就重视对美国国会的工作。1月30日他高兴地出席了国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会见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纳伯德和众议院议长奥尼尔。邓小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针对议员们关心的台湾问题坦率地阐述了中方的立场。邓小平说: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台湾当局可继续管理其军队,还可以保持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业等非官方关系。我们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承担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8](p.50)}

1月31日,邓小平与卡特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合作协定,以推动双方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等领域以及管理、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邓小平强调,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卡特表示:“一个强大而安全的、对世界事务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而一个参与全球事务的、有信心而又强大的美国,显然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9](p.5)}

邓小平访美是在重要的历史时刻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访问,它增进了了解,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事后,卡特总统说,接待邓小平访美是他总统任期中“令人愉快”的经历之一。布热津斯基指出:“邓小平的访问从原先所设想的仅是礼仪性的外交访问变成为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10](p.458)}

邓小平访美后,在他的推动下,仅随后两年里两国就签订了35个协议,在高层互访、经贸合作、文教科技交流和民间交往等方面均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历史证明,1979年1月的中美建交和小平访美,与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一样,成为了中美关系发展历史上的

又一重要里程碑,这两件大事记录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

在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主流,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台湾问题。1979年1月26日,卡特政府向国会提出调整美台关系的综合法案。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此修正案,经辩论后改名为《台湾授权法案》。与此同时,众议院也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案《美国—台湾关系法》。接着参众两院推举代表进行协商,推出《与台湾关系法》,两院分别于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过。卡特于4月10日签署该法,使之成为美国一项国内专门法律并生效。很明显,这是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严重事件。对此,中方作出明确坚定的反对态度。4月19日,邓小平会见丘奇率领的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代表团时,开门见山地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说这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因此,这个法案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11]4月28日,我国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

之后,邓小平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12](p.170)}他还尖锐地指出:“在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13](p.401)}他甚至说到这样的程度:“《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14](p.65)}

然而,美方仍我行我素,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不断制造麻烦,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这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美国售台武器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多次声明,反对《与台湾关系法》,强烈要求美国停

止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在接待外宾时也反复阐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他对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明确表示,已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问题“作好了降低外交关系的准备,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没有回旋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在接见哈默时再次表示,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1](p.125)}1982年4月,美国政府在表示要遵守《中美建交公报》的同时,却决定向台湾出售总额达6000万美元的武器零部件,双方的军售谈判出现僵局。里根总统此时表示愿意同中方通过协商解决售武,并派布什副总统访华。邓小平在5月8日接见布什时说:“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云雾一扫而光。”^{[9](p.80)}邓小平还提到,他的儿子正在美国学习,这说明他对两国关系是有信心的。会见结束时,邓小平指出,现在解决美国向台湾售武问题的时机已到,不要再耽搁了。^①他指出:“这是中国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6](p.247)}在以后的紧张谈判中,邓小平还强调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美国必须承诺在一定时间内逐步减少,直至最后停止向台售武,美国这样做是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如中国许诺不动武等。接着贝克国务卿访问北京。布什和贝克的适时访华,为打破售武僵局起了积极作用。7月13日,邓小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恒安石向邓小平转交了里根总统的信件和美国政府准备的公报草案,里根总统在信中表示,美国不谋求长期向台售武的政策,不会无期限向台出售武器。公报草案除上述内容之外,还同意在数量上和性能上不超过建交后几年的水平,并确认停止售台武器的最终目标,愿意与中国协商,最终解决这一棘手问题。随后,中方放弃了要求美方设置停售的最后期限,同意以逐步减少为条件。^[15]

这样,经过10个月的艰苦谈判,两国终于在8月15日达成协议,8月17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即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双方重申建交公报中确认的各项原则,在武售问题上,美国许诺在数量和质量上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几

年的水准,今后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做到最后停售。

《八·一七公报》的发表,为解决中美建交时遗留下来的售台武器问题跨出重要的一步,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这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又一胜利。在围绕《与台湾关系法》和售台武器问题上的这场较量中,邓小平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鲜明果断的立场,既坚持原则,捍卫主权,又注意斗争的策略和方式,在中美关系史上谱写了重要的一页。

三

在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时,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泰然处之,力挽狂澜,拯救了濒于破裂的中美关系。

布什总统的中国情结中最感人的是他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1975年底,在福特总统访华一周后,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奉调回国,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邓小平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设宴欢送布什夫妇。席间,邓小平亲切地对布什说:“中国将永远欢迎你,即使是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邓小平此举使布什深为感动。谁也没有想到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北京去看看邓小平。他在1989年2月访华时曾回忆说:邓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于思考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上,邓小平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我的夫人结束在北京的任期时,邓小平为我们破例举行小型宴会的情景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②

1988年,布什赢得了大选。在忙于组阁时,就表示了访问中国的愿望。他说:“对于我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前回到中国。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16](p.97)}

1989年2月25日至26日,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了短暂的工作访问。这是自1975年以来他的第五次访华。2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并设午宴送行布什总统。邓小平说:“十年来中美两

^①参见陈锋主编:《中美较量写真(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②参见李立:《目击台海风云》,载《解放日报》2005年6月19日。

国关系的发展是平稳的,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在布什总统任期内,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布什总统表示:“现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和挑战。报纸上有人说,我访问中国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要到中国来。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来访是因为我同意你对我们两国关系的看法,两国关系有很大的潜力。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正因为中美关系已具有自身的价值,我们才能再来讨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挑战。如苏联的变化,欧洲共同体即将一体化,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这也就是我就任总统以来就来访问中国的原因。我们有分歧,都是些小问题,可以进行讨论。但分歧点远远少于共同点。我向你保证,在我4年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要比现在更牢固、更好。”^{[16](p.103)}

布什总统访华时向邓小平所作的关于“在他4年任期内中美关系一定要比现在更牢固、更好”的保证是真心的、真诚的。然而,事与愿违,后来事态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苏东剧变、中苏关系正常化、“六·四”事件突发,猛烈地冲击了中美关系,将中美关系卷入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布什总统希望看到的更牢固、更好的中美关系并没有出现。

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美上空乌云密布。

此时,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智慧、胆略和影响力,驾轻就熟地处理危机中的中美关系,使之化险为夷,出现转机。

10月和11月,尼克松和基辛格先后访华。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他俩的访问具有特殊的意义。尼克松于10月28日开始他的第六次访华,邓小平于10月31日会见了,尼克松急切地向邓小平表示,“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邓小平说:“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

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12](pp.330-332)}

基辛格是11月8日到达北京的。同一天,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他最后一个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1月10日,邓小平会见了基辛格,对他说:“我已退了下来。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言谈中,双方对中美关系充满信心。邓小平向基辛格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问题的建议,并请他回国后向布什总统转达。邓小平一揽子建议内容包括:(1)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某第三国去;(2)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3)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4)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主席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这些建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困扰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①

基辛格带来了布什总统的口信:布什真诚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但在国内强烈的反对面前,他难以这样做,除非他得到明确的信息:中国考虑美国对人权的关注。邓小平对基辛格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②江泽民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也会见了基辛格,希望尽快结束中美之间的不愉快纠葛。基辛格表示,美中双方共同采取行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基辛格回到美国后,没几天,11月15日邓小平回复了布什总统11月6日的来信。邓小平在信中说:“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

①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读了你的信后,我对中美如何共同采取步骤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我已委托基辛格博士向你当面转达。我希望并相信将能得到你的积极响应。我本人和中国政府欢迎你派私人特使访华。”^{[17](p.180)}

12月9日,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与伊格尔伯格再次访华。虽然这之前邓小平已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宣布从此不再代表党和国家接见外宾了,但还是在第二天,12月10日,他破例接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主席也在同一天接见了斯考克罗夫特。

邓小平破例接见斯考克罗夫特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所作的“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讲话是中美之间妥善处理危机、积极改善关系的一个精彩典范。邓小平对美国特使说:

“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尽快解决六月以来中美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取得新的前进,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12](p.350)}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12](pp.350-351)}

邓小平的谈话有高度,有深度,有气势,有胆识,有谋略,有思路,除此之外,还有他那特

有的幽默感。他最后对斯考克罗夫特说:

“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12](p.351)}

在会见时,斯考克罗夫特对邓小平说:“我非常感谢你在退休后,特别是星期天抽出时间来见我。……我完全赞成你的看法。我们准备跟你们合作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他还告诉邓小平:“尽管你退休了,布什总统仍把你当作朋友,永远是朋友。”邓小平接着说:“我们都是熟人,老朋友。”^①

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中共两代领导人的核心,在同一天先后接见美国特使,就如何使中美关系摆脱危机、继续发展作了重要讲话,这在中共历史上和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都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很幸运,因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有邓小平指引方向。虽然退休了,但他从世界全局出发、从中美两国根本利益出发,仍然直接指导和帮助第三代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的突发事件,使之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是他,使中美关系在建交后的头10年,取得了扎实的初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10年的初步发展打下的基础,没有它,中美关系在“六·四”事件后能经受考验,不倒退,不破裂,是难以想像的。可以这么说,这10年的初步基础,虽然未能避免一场危机的降临,但却帮助中美关系克服困难,度过危机,继续发展。

四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不仅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民之路,而且也领导中国经历了国际斗争的严峻考验。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美关系的原则、方针、政策和战略思想。

①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1日。

1.认识中美关系不能离开世界大背景。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中美建交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中美两国人民应当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当前国际形势向中美两国人民提出的历史性挑战。”^{[19](p.13)}10年后，在总结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过程时，邓小平深刻地分析说：“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份量不轻。”^{[12](p.350)}他还强调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12](p.350)}

2.处理好中美关系必须批判四种谬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尖锐地批驳了在美国有相当市场的四种错误观点：其一，认为中国很弱很穷，无足轻重，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其二，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其三，认为如果美对苏强硬，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其四，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视这四点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原则问题，认为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①

3.必须积极妥善地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一直给予极大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也最多。中美建交后，邓小平针对《与台湾关系法》指出，“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过去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7](p.375)}“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12](p.170)}邓小平严肃地提醒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12](p.97)}而要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还是一个台湾问题，解决了，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9](pp.170-171)}

4.解决两国分歧，美国应采取主动，同时双方均作出努力。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针。1989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强调，“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12](p.331)}“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中国不可能主动。”^{[12](pp.331-332)}而要解决矛盾和分歧，“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12](p.351)}

5.处理两国冲突，应以和平方式，不搞对抗。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又一重要方针。他一贯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12](p.70)}“六·四”事件后，中美关系陡然紧张。为了解决两国之间冲突，邓小平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中美不能打架”。^{[12](p.350)}这样才能避免对抗。

6.坚持反对霸权，反对干涉内政。每当中美关系处于重要转折关头，邓小平总是审时度势，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任务。他在冷战行将结束时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2](p.360)}当然，中国重视中美之间的合作，愿意“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12](p.359)}，但“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12](p.359)}

7.处理两国关系，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迈克·华莱士问时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2](p.168)}1989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则更明确地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12](p.330)}而国家利益的核心则是国家主权和安全。“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

①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76-377页。

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12](p.348)}

8.中美关系应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构建战略合作的新基础。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12](p.332)}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发展潜力很大。这一经济基础对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至关重要。把中美关系建立在共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是邓小平关于中美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

9.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建立世界新秩序密切相关。在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中,他反复强调的有两条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他认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12](p.282)}中美之间虽有分歧点,但也有共同处,应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框架里寻求战略合作。

10.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16字方针。1989年下半年,邓小平已决定完全从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9月4日,他向第三代领导集体交待他退休后的事宜时,深刻地论述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大政方针。他语重心长地说:“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着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2](p.321)}后来,又加上一句话,韬光养晦,“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12](p.359)}邓小平这一重要的政治交待既是外交斗争艺术的结晶,也是对美工作谋略的总结。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依据他们关于中美关系

的深刻论述,把对美工作做得有声有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功地处理了中美之间发生的人权、安全、产权、主权(台湾问题)等方面的障碍和冲突,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个字的对美方针,克服困难,战胜危机,把中美关系向前推进,不断地向中美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了21世纪。

责任编辑:云 尔

[参考文献]

- [1]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2]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 [3]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4] 陈锋主编.中美较量大写真(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 [5] 宋连生,巩小华主编.中美首脑外交实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 [6] 阮虹.韩叙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美关系30年[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 [9] 刘连弟,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
- [10] Xbignew Brzezinsk. Power and Principle——Memori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New York: Farrar, Giroux, 1983.
- [11] 倪世雄.邓小平与中美关系[J].国际观察,1997,(4).
-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3] 王俊彦.中美外交传奇[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5] 陶文钊.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J].社会科学研究,2005,(5).
- [16] 陈永祥主编.布什与中国[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7] 钱其琛.外交十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The Difficult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nd Market Economy—The Main Line of China's 60 years'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dividing line, China's economy has witnessed quite a distinct 30-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at. Despite of the great differences,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nd market economy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as a mainline. Although th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been established, China has suffered a few setbacks in market economy during the first 30 years. The following 30 years is quite a success for China's explor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nd market economy. However, this exploration is not finalized, the road ahead is still long. (YUAN En-zhen)

An Important Seg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Outlook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Study of Jiang Zemin's Exposition on Culture: From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to the Sixteenth Party Congress, Comrade Jiang Zemin made a series of expositions on culture, which represent his fundamental viewpoint and perspective on it. These expositions, on the one hand, follow, inherit, enrich and develop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s concept of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provided precious ideology resources for the Marxist Cultural Outlook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link of Marxism's Cultural Outlook Development in China. (ZHANG Jing-rong)

On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Mao Zedong's Development Exploration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ao Zedong an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Leading Collective of the CCP had initiated unswerving exploration to create a Chinese style socialism road. Both the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have witnessed the inheritance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xploration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ion,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 a historical process and a creature of the age emerges. (PAN Jie-jun)

Deng Xiaoping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Deng Xiaoping's four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 In the late 1970's, following Mao Zedong's wish, Deng Xiaoping played a key role in realiz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2)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possessing great enthusiasm and determination, Deng Xiaoping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3) When two countries reached a crisis point, Deng Xiaoping faced it with calmness and optimism, and succeeded in saving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rom collapse. (4)The idea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forward which Deng Xiaoping put have greatly enriched his strategic thinking of diplomacy, and become the important part of Deng Xiaoping theory.(NI Shi-xiong)

The Probe to the Consumer's Unique Consumption Mode in China and the Research on Civil Consumption Demands: To expand the consumption demand is to fulfill the prospecting targe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proper combination of expanding consumption and optimization investment is the key to achiev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virtuous circle of the economic society, as well the potential stimu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Chinese consumption market is developing in the positive direction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consumption demands as the inertial result, however, the move to long period lasting high-rate development still hasn't been ceased. Therefore, we should probe to a consumption mo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civil consumption demands. (YANG Wei)

A Study on Financing Problem of SMEs under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 A Case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financing problem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in China has not been well resolv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aggravated severely by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since the second half 2008. In Zhejiang, a province with well-developed Private Sector Economy, SMEs are suffering a tougher plight with a prominent financing problem.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are adap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making full use of abundant private funds, improving the state-funded commercial bank to prop the SMEs financing mechanism, developing local medium and small financial institution offering service to SMEs, perfecting the venture capital system that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SMEs, and broadening the di-